

柯亨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① 解读的“政治哲学转向”

姜延军, 詹 峥

(南京政治学院 政治理论 一系, 江苏南京 210003)

摘要: 柯亨学术生涯中的“政治哲学转向”, 实际上是他将政治哲学建构为一种解读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新视角的努力。柯亨意识到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遭遇到的社会现实和政治哲学理论两方面的挑战, 是促成其“转向”的主要原因; 柯亨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的独特认识和政治哲学视角的现实运用, 是其能将惯常被理解为不相容的两个研究领域加以结合的依据; 柯亨对挑战的积极应对, 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的政治哲学解读, 值得我们借鉴,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

关键词: 马克思; 社会历史学说; 政治哲学; 解读视角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774(2011)01-0020-06

纵观柯亨 (Gerald Allan Cohen, 1941—2009) 的整个学术生涯, 其“政治哲学转向”^②无疑最受人关注。基于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 (历史唯物主义) 和规范的政治哲学是两个有着巨大差异和分野的学科这种传统认识, 柯亨的“政治哲学转向” (尤其是他还试图将二者进行一种结合与调和) 成为一个令人费解甚至“不可思议”的现象, 激发和吸引了一大批学者的研究兴趣。我们同样关注柯亨的上述“转向”, 但将尝试着从“非断裂”的理论诉求来做出解析。

一、“转向”的缘由——柯亨视野中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研究的时代挑战与“政治哲学冷漠症”的诊断

在柯亨看来, 常常令传统马克思主义者^③感到自豪的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 具有一定的由空想到科学的解释的“合理性”^{[1]6}, 其现实主义地理解社会制度的作用也“确实向前跃进了一大步”^{[1]6}。但遗憾的是, 在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的研究中,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自觉不自觉地将其科学性解读为两个

收稿日期: 2010-12-02

作者简介: 姜延军, 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一系副教授, 哲学博士。

詹 峥, 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一系硕士生。

① 柯亨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 不在于辩证唯物主义, 而主要集中于历史唯物主义, 他常常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指代历史唯物主义, 进而指代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 在柯亨的理论视野中,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同时, 为了避免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一般历史学科的“历史理论”混淆, 本文倾向于使用“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来指称柯亨视野中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② 20世纪80年代, 柯亨非常明确地将自己的研究重心从对马克思历史理论进行“功能性解释”的理解和辩护 (该理论集中体现于他的第一本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A Defence]中) 全力转向了对当代政治哲学进行解析、批判和重建, 产生了《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等一系列代表性成果。

③ 在柯亨的学术生涯中, 他对其他学者关于马克思 (主义) 的言说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并进行了较为明确的区分和评判, 本文中所使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是专指在柯亨视野中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偏差性解读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并不在一般意义上指称以传统方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 “马克思主义者”则是指在柯亨视野中以他认为的“应然”方式和状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 而非指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 更不直接关涉中国的研究情况。

起决定作用的实证性论断，即他们认为“在两种据说是不可压制的历史趋势的共同作用下”^{[1]7}，共产主义的平等必然实现。这两个趋势简单说来，一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兴起；二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柯亨分别剖析了这两个方面，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历史已经把上述预言打得粉碎”^{[1]8}。

关于第一个趋势。柯亨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将工人阶级定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处于不平等的劣势一方，政治地位也往往处于社会末端，这种客观的境遇使得它主观上赞同平等，期待求得平等，而且工人阶级在数量和力量上的不断增长，使得它具有客观的改造社会的能力，能最终掌握政权并推翻它成长于其中的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柯亨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对工人阶级的印象和理解概括为六个特征：多数、生产、被剥削、贫穷、无物可失以及革命。即（1）构成社会的大多数；（2）生产了社会财富；（3）是社会的受剥削者；（4）是社会的穷人；（5）在革命中不会失去任何东西；（6）能够（could）并且愿意（would）改造社会。针对这一认识，柯亨认为，不管人们怎样使用“工人阶级”这一存在很大争议的概念，当今世界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由于受剥削和贫困而与社会主义革命有必然的利害关系、同时由于其本身的生产力和人数而有能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体已不复存在”^{[1]9}。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现在没有获得、将来也不会获得那种理想特征。相反，工人阶级正处在一个解体的过程中，而且它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日益发展的复杂技术和社会管理而日益加速地被减少和分裂。工人阶级特征的分化提出了一种理论上的需要，“这种需要与政治上的需要密切相关，这就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必须从哲学的高度对价值和原则进行阐述”^{[1]9}。如果依然执着于共产主义的自由平等理想，马克思主义者在构想未来时，“必须降低调子，必须一改过去它（共产主义）时兴时的作风，多从道德的角度来维护自己”^{[1]10}。因此，就确信工人阶级会成为那样的群体而言，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假设的第一个趋势并非现实。

关于第二个趋势。柯亨概括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简单思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将导致人类驾驭自然为人类服务的能力不断增强，进而实现物质上的极大丰富，以至任何人实现其丰富人性所需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取自公共储备而不是以他人为代价，而在这种“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2]306}，经济不平等就会消失。对此，柯亨虽然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确实使整个人类

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科学技术也的确依然持续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277}但他强调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富足论”的预设前提，却遭遇了资源方面的问题，即地球的资源并没有丰富到能保证因技术知识不断进步而生产出无限多的使用价值的程度，人类物质财富生产达不到那种可以支撑人们“各取所需”的极为丰裕的状态。今天，生产力发展的自然资源方面的阻碍已经非常严重，全人类正在遭受生态危机。这些都明确宣告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假设的第二个趋势也很难成为现实。

进而，柯亨从学术眼光和研究方法的角度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透析。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两种不可压制的历史趋势”的坚持和信仰根源于他们对政治哲学理论研究的冷漠，对规范正当性（normative justification）问题的忽视，是患上了严重的“政治哲学冷漠症”。何以如此呢？柯亨“诊断”如下：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信仰的共产主义社会，无疑是一个极其美好、令人神往的社会——因为在这个社会中财富极其富足，人们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自由而全面发展”，已经超越了具有显著政治特征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诉求。更令人感到无比欣喜的是，这种社会的到来具有历史必然性：在两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的共同作用下，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既然自由、平等等价值的实现成为必然，而且它们的到来又是如此受欢迎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上去论证为什么这些价值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在哲学基础上具有何种原初合理性以及这些价值的优越性何在……这些规范正当性问题就都是多余的。应该研究的问题是如何促使它尽可能早点来临，如何尽可能少付出代价，等等。在柯亨看来，正是这一思路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哲学理论研究没有强烈的兴趣，他们围绕着的主要是那两个实证性的论断，他们“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价值外围的坚硬的事实外壳上”^{[1]6}。

而另一方面，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政治哲学冷漠症”相对应的，却是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

在柯亨看来，近代以来，经验理性塑造了一个高度“合理化”的生活世界，也带来了诸多现实的问题，使得人们不得不追问怎样在经验与理性、真理与价值、实然与应然之间保持一种张力。“20世

纪后半期以来，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正日益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新的栖居地。”^{[4]26}理论与现实的诉求使政治哲学在当代得到复兴。与马克思主义并非处在同一个阵营的自由主义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风头正劲”，作为自由至上主义者的代表诺齐克（Robert Nozick 1938—2002）影响尤其巨大。柯亨之所以浓墨重彩地提及诺齐克，不仅仅因为他的影响力，而且因为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并不友好”。在柯亨眼中，按照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这部代表作中主张的“资格理论（entitlement theory）”^①，自由即意味着正义，个人的自由是最大的权利，物品进入世界的时候就已经带有人们对它们的种种权利，“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各种不同的人控制着不同的资源，新的财产来自于人们的自愿交换和自愿行为”^{[5]150}，任何出于非自愿的再分配模式都会侵犯人们的权利和应得的资格，都无异于强迫劳动，强行“正义”。这样，在诺齐克以自由为绝对优先的视域中，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以某种模式实行再分配，必然会侵犯人们的自由权利，因此就是不正义的社会。因为要维持某种模式就不得不禁止人们之间的自愿交换和馈赠，否则“任何带有平等主义成分的分配模式都会被个人的自发行为所颠覆”^{[5]197}。单就“正义的社会”而言，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不够纯粹，但因为其较少的再分配且允许人们间的自愿交换和自由馈赠，至少比社会主义社会要来得正义。

柯亨声称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没有现存答案可以将其驳倒的反社会主义的论断，直到有一天他了解到诺齐克提出的那个反对社会主义的“张伯伦论证”^{[8]3}，觉得自己受到当头一击，也“开始从教条社会主义的麻木中苏醒过来”^{[1]4}，并且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政治哲学上。因为，“政治哲学冷漠”正是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研究的病症所在，而诊治之道只能是对症下药。

我们同样以上述两个趋势的分析为例。当柯亨

从政治哲学视角出发来思考时，他认为，对于第一个趋势，即使我们可以假设理想的工人阶级（具有那六个特征）存在，那么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解读的这一工人阶级的革命意愿和革命能力也会使得革命的成功成为一种类似于自然规律的水到渠成，因而根本无需把社会主义变革的正当性说成是规范原则的问题。对于第二个趋势，当共产主义所依赖的社会富足条件遭遇到资源和生产力障碍时，平等要求就必须建立于一个新的基础之上。“未来（据说）必然会实现物质的充裕，这是预测平等的一个根据，而目前持续存在的物质短缺则是要求平等的一个根据。”^{[1]11}因此，柯亨指出：“我们必须比过去更为清楚地了解，我们所要寻求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寻求是合理的，如何才能以制度的形式把它加以实施。”^{[1]13}

至此，不难发现，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遭受的理论挑战和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忽视政治哲学研究的不满促使柯亨“政治哲学转向”的直接动因。正是由于柯亨敏感地觉察到政治哲学领域的微妙变化，他才得以告诫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还沉迷于虚幻的实证性论断之中，当遭遇到来自政治哲学领域的挑战和攻击时就会十分脆弱而无力抵抗和还击。当然，这一转向绝不意味着柯亨改变了自己的学术立场，其转向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对挑战的积极应对而非妥协。

二、“转向”的实质——柯亨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政治哲学新解读视角的建构

如何调和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与政治哲学之间惯有的紧张关系，从而铺就这条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政治哲学解读之路呢？柯亨明确摆出了两大根据和理由：一是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内在地蕴涵着政治哲学价值和资源；二是政治哲学可以作为一种研究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的新视角而“出场”。

我们先看看柯亨对政治哲学的一般看法。在柯

① “entitlement theory”是诺齐克理论建构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何怀宏、王天成、罗克全、萧韶、徐大同、陈闻桐等学者的译著或研究中把这个词与“权利”（Right）相通，译为“权利理论”，一个现实的后果是，使得国内多数学者（尤其是一般性读者）倾向于把诺齐克定位为一个以自然权利证明实体权利的（比较极端的）权利本位论者或者说是人权鼓吹者（参见龚群、诺齐克与罗尔斯比较——一种个人权利论〔J〕教学与研究，2005〔4〕等等），对于诺齐克的研究也往往只能停留于“权利基础理论”（Right-based theory）的层面，而几乎意识不到“权利”这同一个概念背后所表征的实质含义还是需要进一步辨析的。与此相对应，邓正来、万俊人、冯克利、刘莘、顾肃等学者则倾向于将 entitlement 译为“资格”以示与权利（Right）的区别，去着重强调诺齐克“资格理论”（entitlement theory）的程序性意义（参见顾肃、持有权与程序正义的当代阐述者——评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权利理论〔J〕学海，2002〔3〕等等）。但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一般性话语体系中却无法借此清晰地表明资格与权利的区别，至少没有唤起对这一区别的普遍关注。此涉及关于诺齐克的专门研究，本文不予讨论，但将统一采用“资格理论”这一表述。

亨还是伦敦大学学院的青年讲师时，受聘教授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可能正是因此而决定了柯亨的政治哲学常常具有浓厚的道德哲学色彩。综观其政治哲学研究，对于某种政治价值，他总力图探寻其道德“合法性”。据柯亨自己所言，他的政治哲学观是标准的学院派观点，与其他学者并无迥异：政治哲学是用抽象的哲学反思研究规范性判断的本质和真理性的非历史学科^[1]。政治哲学中的规范性命题（如某些价值判断）的正确与否与时间无关。而且，他的这种看法在其研究重心转向前后都是一致的。

而对于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的看法，柯亨则与其他学者存在差异。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看来，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是一种地位与19世纪历史地质学相类似的关于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动力的实证理论。它与规范性哲学并不是一点关系没有，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基本没有规范性研究的价值取向^[1]。因为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解中，要么就是不存在规范性真理这样的东西，要么它就是随着经济环境和经济需求而历史地变化的。正因为如此，这些自认为熟悉马克思主义与英美传统政治哲学的人认为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与政治哲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原则性差异，二者是不相容的。但是柯亨并不同意这一认识，他认为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的这些所谓主流认识并没有反映出其真实的政治哲学内涵。

第一，虽然柯亨曾经在参加加拿大共产主义运动时就信仰过一般马克思主义，但在大学教书时，他就渐渐放弃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因为他认为这种哲学根据在价值观上通常导致怀疑主义，或者至少是相对主义，这与规范性价值判断是不能相容的。这样，柯亨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保留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为进一步消解政治哲学规范性真理之非历史性和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之历史性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基础。

第二，柯亨从来不认为规范性价值原则与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尤其是作为理论现实实践的社会主义运动）无关。他认为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并没有把一切价值和原则都简单归结为阶级利益的合理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实际上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对一些非历史性规范价值原则的追求。所以，柯亨转而关注政治哲学并不影响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他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的信奉并不影响他的政治哲学观点，他甚至更愿意强调这二者的结合：政治哲学追求的规范性终极真理是历史中的不变量，虽然历史环境无疑会影响规范性价值原则（例如公

正）的具体要求，但它们之所以能施加这种影响，就是因为永远有效的规范性价值原则（例如公正）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内容。

这样，在柯亨那里，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虽然没有以一种直接的政治哲学的面貌出现，但其所饱含的政治哲学意蕴已经为进行一种独特视角的深入考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基于此，柯亨充分发挥其训练有素的分析哲学方法，走上了以新视角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的建构和运用之路。

首先，牢牢立足于政治哲学这一共同平台，针锋相对地积极回应了来自自由主义尤其是自由至上主义的挑战和攻击。柯亨认为在遇到来自这些理论挑战之后，再也不能像某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笼统地认为对社会主义的反对只是“受阶级和其他偏见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1]而已，而是必须做出严密的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探索来进行积极回应。因此，充分论证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蕴含的规范价值所具有的道德“合法性”以及这些价值所具有的优越性，成为柯亨建构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政治哲学解读视角的必要工作。以“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一马克思主义者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例，柯亨一改从政治经济学层面着手的传统方法论选择，认为资本主义批判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而不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在为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批判之间的关系“松绑”之后，柯亨进而缓减在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之科学性与资本主义批判之政治伦理性之间的紧张，解析自由主义者政治哲学思想的根本根基，揭示出自由主义者具有意识形态隐匿性的“滥用自由的语言”，从而最终论证他所珍视的社会作为共同体的平等价值的优越性、可欲性与可得性。

其次，紧紧抓住政治哲学这一明确对象，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逐步挖掘和重构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中的政治哲学资源。柯亨在将研究重心转向政治哲学之前，并不是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的规范研究问题。因为在那时期柯亨的理解中，社会主义的“势不可挡”及其价值取向所具有的优越性都如此的不言而喻，以至于根本无须进行道德合理性的辩护，“人们只是因为受阶级和其他偏见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才反对它”^[1]。但不得不进行的转向，让柯亨将研究重点置于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所蕴含的规范性价值上来，并挖掘整理出一系列的重要结论：“平等、结社和人的自我实现这些价值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很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自己赞同某种平等观，也许任何人都不能明确地说出自己所赞同的

平等原则是什么，但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赞同某种平等观的”^{〔1〕6}；“马克思主义者极少用哲学术语来讨论公正，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对公正漠不关心”^{〔1〕3}；实际上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恰恰阐明了不公正的各种历史形式（如奴隶制、农奴制和无产阶级的状况）以及消灭不公正的办法，等等。有了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中的这些政治哲学主题的敏感把握，柯亨的政治哲学解读视角的进一步建构就有了“可炊之米”。

三、“转向”的评析——柯亨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政治哲学取向的拓展和误读

理论本身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史就是一部不断发掘、发现、创新、创造和去伪存真的历史。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阐释，进而认识、深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社会功能，并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而言，柯亨无疑在这部历史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一席。

首先，柯亨的解读方式对某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方式产生了冲击。教条式的理解方式，往往从本本出发，死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条，断章取义，而不注意研究理论言说的特定语境和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实践背景。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的教条式理解使其失去了应有的批判性和理论活力，历史上也造成了诸多严重的理论后果甚至实践灾难。具体到我们论题所及的政治哲学解读问题，对于相当多的学者来说，“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为社会主义进行道德或政治哲学的论证是一件极具风险的事情”，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对平等、自由、正义这些政治哲学原则猛烈批判”^{〔6〕2}。这使得他们对于道德和政治哲学层面的理论要么不屑一顾，要么斥之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柯亨却甘愿冒这种风险，为此付出20多年的心血，坚持政治哲学的研究，从这个特别的视角入手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意蕴进行挖掘，深入探讨，拓展理论。这种新解读视角的建立与运用，对那种过分倾向于以辩证唯物主义概念套社会历史学说、忽视政治哲学层面价值维度的研究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松动了长期以来对马克思政治哲学层面的理论研究近乎“拒斥”的僵化的态度和眼光。

其次，柯亨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政治哲学意蕴的挖掘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柯亨以他的独特方式找到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和政治哲学的“交集”，并且使它们彼此相容，相互作用。这种新解读视角的建立，必然要以一种政治哲学的言说方

式考察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的价值蕴涵，实际上这也就开辟出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概览这一领域，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鉴于当时特定的理论氛围和无产阶级现实斗争的影响未曾得到很好的研究的问题，如从根本上看何谓正确的生活？什么是人类最值得追求的理想生活？何为最好的政治秩序？自由与平等何以得到最好的协调？社会正义问题是否可以真正被超越？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得以在当代政治哲学话语体系中重新被思考。另一方面，政治哲学研究方式与社会历史学说中的一些主题的结合，必然形成一些新的理论生长点，带来新启发、新气象，可能产生出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甚至，对于柯亨的这个开头的合理性，对其探讨问题的方式、内容等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进一步的支撑，或反对，或提出更好的见解和处理办法等等，都不啻为一种积极的尝试。在这个意义上，柯亨还仅仅只是开了个头。

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并不拥有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解读的“垄断权”，但是在方法论和原理层面必须有所坚守。针对柯亨的前述反思，在把握其创新性、合理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跳出柯亨个人的理论囿域，看到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并非所谓的“政治哲学冷漠症”，甚至政治哲学解读视角的建构也并非是现代发展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唯一可能的理论选择。

首先，柯亨对政治哲学的“学院派”理解有其先天的局限性。如前所述，柯亨曾直言其政治哲学观是标准的学院派，即政治哲学是用抽象的哲学反思研究规范性判断的本质和真理性的非历史学科。这种政治哲学观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前提预设——存在某种永恒不变的规范性判断（价值理念）。当柯亨强调，“规范性终极真理是历史中的不变量，虽然历史环境无疑会影响（例如）公正的具体要求，但他们之所以能施加这种影响，就是因为永远有效的公正原则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内容”^{〔1〕3}。如果我们不是惹怒探究，却多少有些令人费解，为什么非要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公正的具体要求之上悬设一个作为“终极真理”的“公正”原则？这种抽象到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公正原则对于理论和实践来说是必须的吗？无数的历史实践证明，这种近似于柏拉图纯形式的“最圆满的圆”一样的原则，即使能够跳出纠缠于脱离现实社会条件和历史发展进程的概念分析这一“形而上学”的桎梏，也常常沦为一种空洞的政治概念，甚至被社会中的各方力量拿来“为我所用”。以这样一种严格的学院派政治哲学眼光审

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学说，固然能挖掘出一些符合他所理解的“终极真理”的价值蕴涵，但从根本上讲绝不能凌驾和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意蕴的挖掘并不必须借助“规范正当性问题”的探讨。柯亨政治哲学视角的具体建构和运用主要是以他惯用的分析方法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中一些“规范正当性问题”进行讨论。正是由于这一先入为主的研究方式使得他诊断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哲学冷漠症”，甚至认为马克思本人对政治哲学的问题也是“漠不关心”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真的留下了政治哲学的“真空”吗？柯亨运用的传统政治哲学的讨论方式是挖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蕴涵的唯一选择吗？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到阿伦特的一个认识：倘若有一个哲学家，为了使哲学在政治中得以“实现”而离开了哲学，便意味着政治哲学的末日降临。阿伦特的评价是更为中肯的。如果我们单纯顺从柯亨的眼光，政治哲学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确实显示出一种“空场”状态。但是，这种“空场”实质上正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个附属结果，政治哲学问题本身在“哲学革命”中已被消解重构。如果不能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不能理解马克思离开政治（哲学）是为了使政治（哲学）在其整个哲学中得以实现并由此达成政治与哲学的高度统一，也就无从在整个理论体系的层面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虽然在当今政治哲学复兴的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成为一种时代的需要（甚至仅就更好地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也是这样）。但是，这种发展绝不能简单置于传统的政治哲学方法论基础之上，否则就有陷入“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囿域之嫌，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使之前的方法论变得不可选择，马克思的名字在思想史上以创建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理论

结合而著称。对马克思而言，政治哲学上所规定的义务、责任、权力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所谓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主题，都可归结为政治权力以至经济权力的“事实关系”或“客观关系”，在传统政治哲学看起来具有不能质疑的原初给定性的道德原则和基础，恰恰都必须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检验。

这样看来，柯亨所强调的对“规范正当性问题”的探讨还有进一步还原的必要，而“历史唯物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治哲学”^{〔8〕13}。当然，这并不是要把历史唯物主义当成政治哲学，而是需要理论工作者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而非纯粹柯亨方式的方法论原则，通过艰辛的探索构建和发展出一种边界更为清晰，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责任编辑 何怀远〕

参考文献：

- 〔1〕〔英〕G A 柯亨. 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陈晏清，王新生. 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及其意义〔J〕. 哲学研究，2005（6）.
- 〔5〕〔美〕罗伯特·诺齐克.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6〕〔英〕G A 柯亨. 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 〔7〕贺照田. 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 〔8〕张文喜. 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的两种论说〔J〕. 学术研究，2006（7）.

Gerald Allan Cohen's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Reading Marxist Social History

Jiang Yanjun Zhan Zheng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Gerald Allan Cohen's academic career is in fact an effort to analyze Marxist social historical theory in a new angle. Cohen realized that Marxist social historical theory was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es from both social realit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his "transformation". His unique recognition of and his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angle on Marxist social historical theory are the basis for the combination of two research fields which used to be understood as incompatible. Cohen's active response to these challenges and his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Marxist social historical theory are worth our learning and give much food for thought.

Key words: Marx; social historic theo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gle for analysis